

文学评论丛刊

当代作家评论专号

20

WENXUE
PINGLUN
CONGKAN

当代作家评论专号之三

文学评论丛刊

第二十辑

《文学评论》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作家评论专号之三
文学评论丛刊
第二十辑
《文学评论》编辑部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兵部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 印张 296字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500册
统一书号：10190·163 定价：1.45元

目 录

- 她心头火光熠熠，笔下清风习习……………程 蕃（ 1 ）
——评宗璞的小说创作
- 描湘西乡土，抒土家风情 ……………郭小东 陈剑晖（ 25 ）
——论孙健忠的小说创作
- 清露无声万木中……………盛 英（ 48 ）
——试论叶文玲小说对美的探索
- 闪射着新时代风采的奇葩 ……………曾镇南（ 67 ）
——论古华的小说创作
- 他，在走自己的路 ……………刘敏言（ 85 ）
——论张一弓小说的思想和艺术追求
- 周克芹小说创作论 ……………陈子伶（ 104 ）
- 用诗情向未来寄发信息 ……………杨忻葆（ 121 ）
——谈祝兴义小说的艺术深度
- 论高缨小说的诗情画意 ……………邓仪中 仲呈祥（ 138 ）
- 他把笔触伸向人物的灵魂 ……………张 韧（ 155 ）
——评温小钰、汪浙成的小说创作
- 准确、深刻地揭示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曹天成（ 176 ）
——读中杰英作品札记

他给农村新人创造带来了什么? ……………贺兴安(197)

——王润滋短篇小说读后

质朴与芳香……………杨世伟(213)

——评韩石山的小说创作

试论张笑天创作的思想倾向……………张毓茂(230)

谈孟伟哉小说创作的若干特色……………王如青(248)

当代知识青年的“三部曲”……………仲呈祥(261)

——评叶辛的三部长篇小说

何士光和他的短篇小说……………朱洪(278)

富于个性的艺术探求……………白桦(292)

——评路遥的小说创作

“固执地追求美好因素”……………冯锡刚(306)

——试论理由的报告文学

当代人情绪的历史……………杨匡汉(322)

——论邵燕祥的诗

白杨飞絮 柔婉秀丽……………任愔(344)

——论雁翼诗的艺术风格

流沙河与他的诗……………张放(359)

心底的歌……………曹进(383)

——评舒婷的诗作

《当代作家评论专号》之一、二目录

编者附记

她心头火光熠熠，笔下清风习习

——评宗璞的小说创作

程 菁

宗璞曾在短篇小说《米家山水》中，用“画上清风习习，心头火光熠熠”来描绘女国画家米芾予创作时的心境和她所作山水画稿的意境。如果借这两句话来形容宗璞自己的小说写作，我觉得是同样贴切的。读她的小说，我们总是能从那清风习习的画面，看到作者火光熠熠的心胸，从而激起对生活、对人民、对党和祖国的由衷热爱和对各种美德，如忠诚、正直、善良、舍己为人等等的敬佩思齐之心。宗璞不止一次地说过，她创作的目的，是想“为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人增添一点抉择的力量”，至少“减少些许抉择时的痛苦”。应该说，这目的是达到了的。

—

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宗璞已开始文学写作，并发表了一些

习作。大学毕业以后，她发表过一些短文、评论和儿童文学作品。现在收在《宗璞小说散文选》^①中年代最早的一篇，是一九五〇年写的短篇小说《诉》。它以一个女工自述的形式，控诉旧社会，欢呼党给她带来的新生活。作者的政治热情洋溢，语言摹拟能力很强，但笔调却显得拘谨、稚嫩。真正引起广大读者注意的，是她在一九五六年底写成、发表于次年七月号《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红豆》。

《红豆》是宗璞的成名作，却也给她带来了莫大的烦恼。当时有一篇评论文章严厉地责问她：

这篇小说中特别突出的“陈旧恋情的痛苦回忆”，究竟是什么样的—种思想感情呢？

这样一个极端仇视革命的祖国叛徒——齐虹，有什么值得“好的党的工作者”的江玫这样痛苦的怀念？而这样一段并不光彩的爱情，这样一个在感情上堕落到失掉立场的“党的工作者”的江玫，又有什么“美”的地方值得作者这样渲染和宣扬？作者在引导我们爱什么、恨什么？作者写这篇作品的目的又是什么？^②

这一类“左”得可怕的文艺批评，在一九五七年的历史条件下出现是毫不奇怪的。经过廿多年正反面经验的教育，今天的人们自然一眼就能看出这类文艺批评的荒谬之处。

《红豆》的内容不过如此：女大学生江玫一度 and 资产阶级子弟齐虹相恋，在北京解放前夕，齐虹要飞离祖国，江玫则决心投身革命，他们的爱情破裂了。后来，江玫成长为党的干

① 北京出版社1981年出版。

② 《在感情的细流里——评短篇小说〈红豆〉》，载《人民日报》1957年10月8日。

部。可是，当她重返旧地时，却也不免触景生情，颇感惆怅。诚然，作者在小说中赞美了江玫的初恋，渲染了她对昔日之爱难以忘怀的感情，但小说通过江玫的行动和思想变化却主要是表现出“爱情诚可贵，甘为革命抛”的主题，从而显示出无产阶级革命和党的事业的无比巨大的感召力，显示出人的本性和感情（哪怕是少女的初恋这样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感情）都不能不受阶级立场制约的道理。类似的情节和思想内容，在中外革命文学作品中不乏成功的先例。

堪称共产主义青年教科书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写了保尔·柯察金少年时代与林务官女儿冬妮亚的恋爱，尽管他俩本来不属同一阶级，后来更是分道扬镳，但小说在写他俩纯洁无邪的初恋时，显然带着极大的温情。奥斯特洛夫斯基既深刻地揭示出阶级的分野使他们爱情不能继续下去的必然性，又深情地回忆了他们的初恋，把它写得很美很动人。也许还可以举出苏联三十年代另一部著名小说《没有寄出的信》。这是一个被遗弃了六年之久的妇女，在接到丈夫要求重圆破镜的信之后所写的五封信。在信中，她虽很委婉却很有力地控诉了丈夫的自私和薄倖。在写到她的朋友曾劝她把这个丈夫忘掉，她却无法办到的时候，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不，要把一个心爱的人从自己的生活里抹掉不是那么简单的，即便你已经发现他不值得你爱！要是当真那么干脆的话，那只说明我对你的爱情从一开始就不是真实的！”这是一个在爱情生活中受到直接伤害的妇女，对加害于她的人说的话。人的感情，就是这样复杂，微妙，充满了似乎不可思议而又有根有据的矛盾。如果作家对这样的感情硬要人为的剪裁、切割，那么，他们的作品距离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就未免太远了。

如果以《红豆》与前面提到的作品相比，小说中对江、齐

爱情的描写，对江玫复杂感情的揭示，就并没有什么更难以理解之处。

平心而论，《红豆》这篇小说为了提高思想性，起到作者努力追求的教化作用，在对江玫、齐虹爱情的描写中已经颇费苦心。从这苦心，我们既可看到作者创作思想的某些侧面，更可看到作者所处的是怎样一种创作环境。

《红豆》写了江、齐的恋爱，但并不是为写恋爱而写恋爱。它是把恋爱放在新、旧时代殊死搏斗、即将交替的背景上来写的，它把男女主人公决裂的原因主要地归之于他们政治立场的无法调和。这样，这篇小说的立意就比较高了。而在具体写到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关系时，小说又显然力避从女主人公恋爱当时的心境去体验和表现的写法，实际上更多地是从女主人公成为党的干部之后对这段爱情所持的批判态度出发，因此，它致力于揭示这爱情的阶级属性及其破裂的必然性。

小说告诉读者，江、齐二人虽在热恋着，其实他们相爱的基础非常微薄而脆弱。小说一开始就竭力从正面和侧面突出齐虹的极端自私和对民主运动的不理解（后来是敌视）。小说让齐虹向江玫大谈“人活着就是为了自由……自由就是什么都由自己，自己爱什么就做什么”的人生哲学，又让齐虹突如其来地说出：“我恨人类！只除了你！”最后甚至让他公然向江玫宣布：“我恨不得杀了你，把你装在棺材里带走”，以揭露他的自私、残忍和野蛮。小说实际显示：江、齐二人除了有相近的文艺爱好外，在别的任何方面几乎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小说更写到江玫周围的人对齐虹一致的恶感。小说这样写，是想给江、齐的最后决裂作好必要的铺垫，同时说明他们的决裂不单是政治立场冲突的结果，也与思想、性格的冲突有关。

作者的用心无疑是的，也能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却造成

了两个问题。一是艺术上某些生硬、斧凿的痕迹。对齐虹的描写太一面倒了，他几乎成了自私二字的形象图解，这难免削弱了江玫对他一往情深的客观根据。随之而来的是二，恰恰授人以柄：既然齐虹这样糟糕透顶，既然有那么多人提醒江玫、规劝江玫，可是她竟直到最后一分钟尚难斩断情丝，岂不说明江玫的思想感情确实大成问题吗？这也就削弱了江玫以后成为一个“好的党的工作者”的依据（虽然小说对江玫如何走上革命道路花了极大的气力去写）。

这里似乎有一些无法克服的矛盾：既要写江、齐二人政治上的决裂，怎能再去畅写他们恋爱的纯洁美好的一面？因为要揭示他们决裂的必然性，就把男主人公从表情到心灵都写得冷酷而丑恶些，然而这又使女主人公的形象蒙上了阴影。小说的这些矛盾，很象是作者在写作时心理上惶遽状态的曲折反映。在感情上，作者也同江玫一样，对这段爱情有所惋惜，颇难忘怀；但在理智上，作者却懂得必须态度决绝地对这段爱情给予“重新认识”，并加以“深刻批判”。这也就造成了小说客观效果的矛盾状况，一方面，一部分青年读者主要是欣赏在当时一般小说中很难见到的江、齐恋爱的那种浪漫蒂克情调，也就是说欣赏作者无法抑制地流露于小说字里行间的真实情感；另一方面，则是某些人对江玫及小说作者的猛烈批判。这两种反应显然都是片面的、各取所需而远非实事求是的，但却不能说与作品本身的内在矛盾毫无关系。而作品的内在矛盾，当然又与作者内心的矛盾相关着。而且，作者的这种心理状态当然不会是凭空产生的。那时，宗璞在创作道路上尚未受过什么挫折，照理思想和手脚都应能比较放开，但是从小说对江、齐爱情，特别是对齐虹形象的处理上，已可明显地看出某些文艺戒条的束缚和影响。毋庸讳言，作者在下笔时是有所顾忌的，是

料到某些批评者可能的攻击方向而事先有所防范的。不过在极左的批评面前，这些努力并未奏效罢了。

我们指出《红豆》的内在矛盾和它所曲折反映出来的作者内心矛盾，并不是想对这篇作品有所非议。这篇小说出现在1957年，无论在题材和写法上都已是一个不小的突破。我们只是想通过分析，指出这篇小说带有的这种特定的时代烙印，这样也许能够有利于年轻的读者们较好地理解它，而不会用今天或今后的文学创作去要求这篇产生于五十年代的作品。同时我们还想指出，《红豆》在今天和今后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它通过江玫的经历，写出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怎样在斗争中成长”^①，写出了解放前夕至五十年代中期我国青年知识分子积极投身革命、自觉自愿地在革命斗争中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勃勃生气，从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历史上那个天翻地覆、欣欣向荣的时代。以江玫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小说作者宗璞无疑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反蒋民主运动的火热斗争中接受了初步的考验和教育，那时激起来的高昂革命精神，一直保持了下来，促使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着。他们在政治上未免稚嫩，他们身上或许背有旧社会带来的大小包袱（例如，对于昔日爱情的怀想，一度就是江玫身上的一个包袱），但他们都有一颗“向太阳”的赤诚的心，他们愿在党的教育下毫不畏惧地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努力克服旧我，舍弃小我，自觉地投身到革命大熔炉中去（小说的末尾江玫截断回忆，收起泪容，含笑迎接前来看她的同志们，便是一种象征），决心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是从青年时代就接受党的培养教育的极有希望的一代。《红豆》这篇小说尽管

① 《“红豆”的问题在哪里？》载1958年九月号《人民文学》。

在表现技巧上还不成熟，但它的基本思想倾向无疑是积极的，引人向上的。如果在当时有部分读者偏于欣赏小说的爱情描写，这种偏向本不足怪，并不难通过适当引导加以扭转。而且如果不割裂整个作品，单就描写爱情来说，也并没有什么不健康的地方。至于今天，这小说倒可以说是一种珍贵的历史纪录——如今成为各条战线，尤其是科技文教战线上中坚力量的，不正是江玫的同时代人或虽稍晚于她，但也已步入中年的知识分子吗？这一批人在五十年代中期的精神状态，与江玫或相似，或相近，或相通。总之，江玫有一定的代表性。而江玫和她的创造者在那以后一、二十年中的坎坷遭遇，也是满可以作为那一大批人实际命运的代表。

二

《红豆》的发表为宗璞赢得声名，但随后却使她遭到严厉批评，并迫使她多次自我检查。这次经历给宗璞所造成的精神创伤究竟多大多深，对她后来的创作究竟影响如何，她从未在文章中正面陈述过，但从她六十年代的某些作品，从她的新作——中篇小说《三生石》和短文《〈红豆〉忆谈》中我们多少可以揣度出一些。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知识分子大批下放农村，阶级斗争的弦愈绷愈紧。在这个背景下，宗璞的创作发生了明显变化。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笔触开始伸向农村，她写出了《桃园女儿嫁窝谷》、《湖底山村》、《无处不在》等反映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小说、童话和散文。（二）作品的基调变成对现实单纯、直接的歌颂，尽量避免知识分子式细腻而婉曲的表现（尽管那其实也还是在歌颂）。（三）在写到知识分

子的时候，不再写象《红豆》中江玫那样由幼稚到觉醒的人物，而把萧素那种一开始就革命的先进分子推到前台，也不再写知识分子的爱情，以此来切断“小资产阶级情调”流露的通道。看得出来，宗璞在这段时间里，正象她后来在《三生石》中所刻画的女主人公梅菩提那样，因为承认“自己文艺思想有问题，感情不健康”而努力地“重新剪裁自己淡泊的性格，炼铸自己柔弱的灵魂”，强迫自己在以前所酷爱的那些诗句和音乐面前，扮演战斗的批判者的角色。正如宗璞所说：“那真是艰苦的历程呵”^①。可是艰苦尽管艰苦，宗璞那时还只是努力从自身寻找原因，不断严格要求自己，并没有对这种做法有所怀疑。六十年代要求上进的知识分子大多如此。宗璞在创作上的那些新特点，便与这种痛苦的历程颇有关系。

宗璞的努力使她在当时获得了好评。她的《桃园女儿嫁窝谷》在《北京文艺》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号发表后，很快便得到赞扬，把这视为她下放锻炼思想改造的成果。童话《湖底山村》也得到了肯定。

可是作者宗璞自己对《桃园女儿嫁窝谷》这篇作品，却似乎不很欣赏，不把它收入自选集，便是一个迹象。也许作者这样做有她充分的理由，可是笔者对此却有一些不同想法。我以为，对于从特定历史环境中产生而又多少反映了那个环境的文学作品，应当严格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点来加以评价。对古代作品，固然必须如此，对当代作品也必须如此，诚然，《桃园女儿嫁窝谷》写到了一些被现行农村政策所明确否定的东西，如农村公社化时期的共产风、浮夸风乃至大办食堂之类，但这一切明明是我国社会历史中不可抹煞的事

^① 本段引文见《三生石》第二节。

实,小说对这些事实的反映又颇有分寸,未加人为的过分夸饰,而且小说着重表现的山区人民改变贫穷面貌的决心,富队女青年自愿到穷队安家落户的勇气以及农民老四爷那种乐于助人的精神,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是动人的,需要发扬光大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小说中,这一些都以农村公社化运动为背景,但实际上它们与共产风、浮夸风并没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

现实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千变万化的。在大好形势下,仍会存在某些困难和问题,甚至仍有阴暗面乃至死角;在困难时期,也未必就到处漆黑一团。作家的职责是面对他所接触到、体验到的社会现实,尽可能作出忠实的反映,为历史留影,也教育读者。因此,即使在真正的大好形势之下,也不必要求作家的创作全是歌颂,一遇暴露就皱眉蹙额,而应具体地看一看,他暴露的究竟是什么。同样,如果历史前进了,我们对某一个阶段(比如对大跃进和农村公社化运动时期)的形势有了新的、与前不同的估计,也不必对反映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的评价一律来个大翻个。除了应该考虑到作家永远受制于时代这个一般规律,考虑到我国某一时期的政治条件、创作环境等特殊条件之外,还应该具体地看一看作品究竟写了些什么,又写得怎么样。

对于造成宗璞创作变化的客观原因,也应该作具体分析。下放劳动在我国一度曾作为对有问题或犯错误者的惩罚手段,这是事实。但是在城市和书斋长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事业者,到工厂或农村去劳动、生活一段时间,却实在并非坏事,如果处理适当,那是不能视为“迫害”的。宗璞的父亲、一位多年从事哲学史研究的老学者,在《宗璞小说散文选佚序》^①中说到,世界上有两种书,一种是“无

^① 载《读书》1982年第一期。

字天书”，一种是“有字人书”，“自然、社会、人生这三部大书是一切知识的根据，一切智慧的泉源……这三部大书虽然好，可惜它们都不是用文字写的。故可称为‘无字天书’……读有字人书当然也非常重要，但做为从事文学创作的人，绝不可只以读有字人书为满足。而要别具慧眼，去读那‘无字天书’。”不能否认，下放劳动便是促使人们走出书斋，接触社会去读“无字天书”的办法之一。宗璞在因写知识分子受挫后，到农村去了，这对于她写作题材和作品基调的变化，对于她略一沉默之后又能重新活跃在文坛上，显然是有积极作用的。当时她所取得的成果，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可喜的。

“左”的、不公正的文艺批评伤害了被批评者，也损害了我们的文艺事业。在这种批评下，宗璞不再写爱情，更不必说知识分子的爱情了。我们因此少看到许多旖旎优美的篇章。但是道途虽然日益窄狭，人们和事业却还是要前进的。这就要看各人的才能和适应力了。宗璞经受住了考验，凭着“总要尽力地放光，尤其在困境中”这样的顽强信念，创作出《不沉的湖》、《知音》、《林回翠和她的母亲》等较为优秀的小说。凭着胸中熠熠的火光，她在寒冷的空气中，放出后来在《萤火》一文中描写的那种“点点银白的、灵动的光”。

《知音》创作于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广州会议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以后。当时党着手调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感到温暖和鼓舞。这小说所描绘的理想的师生关系，其实正是党的政策的一种具体化。它的作者显然正是以此来表示对党的声音的由衷欢呼和热烈响应。而在今天看来，我们更可以感受到，这是反映了知识分子对他们和党的关系的一种希望，一种美好的回忆，一种对在六十年代初曾出现过的短暂转机的珍惜，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歧视知识分子政策的反

省。

小说《林回翠和她的母亲》^①可贵之处是早在一九六二年就揭露了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泛滥成灾的社会问题：走后门。也许今天看来，当初使作者感到心情沉重的消极现象，与今日生活中某些事情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丝毫没有有什么尖锐性了。重读旧文，抚今思昔，人们不能不强烈地感到振刷社会风气的急迫性。

需要说明的是，肯定宗璞在《红豆》被批以后创作上的坚韧努力和她所取得的成绩，并不是无视那批判带给她的种种损伤。我们只是说，在道途窄狭、荆棘甚多而思想和手脚又被无形桎梏束缚着的情况下，宗璞还能取得这些创作成绩，并使她的作品依然保持结构井然、富于感情、描写细腻、文字清丽等风格特色，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是在更为民主一些的气氛中，她本来是可望取得更多更好的创作成果的。

三

从一九六四——一九七七年，宗璞的创作之笔沉默下去了。当宗璞在一九七八年重新发表作品时，我们发现她的风格有了某些重要变化，这就是其作品政治性的加强和感情的激愤化。前者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段时期内一般文学作品（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的共同特征，后者则更多地显示了宗璞个人风格的某种变异，但归根到底，二者都是时代使然。

一九七八年以来，宗璞在创作上，可谓成绩斐然。她连续

^① 收入集子时题目改为《后门》。

发表了不少小说和散文，其中《弦上的梦》获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三生石》获一九七七——一九八〇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是能代表宗璞小说思想艺术新水平的作品。

《三生石》反映的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的生活，中心人物是大学教员兼小说作者梅菩提。尽管作者在文前声明：“小说不过是小说”，但人们读了它，还是能感受到很强的自传色彩。作者宗璞显然是将自己的思想历程和在人生道路上的种种经验和感受，较多、较集中地赋予了梅菩提这个形象，这是一个在精神上与作者密合无间的人物形象。

梅菩提善良美丽的心灵和她的罗曼史无疑是动人的；但更能拨动读者——尤其是那些与菩提年龄相仿的中年知识分子——心弦的，还是她那痛苦的思想历程，是她对于自己以往所走过的道路的检讨和从切身感受出发所作的对于极左路线的控诉。

小说告诉我们，梅菩提在五十年代初“属于又红又专的类型”，一九五六年，她发表了一篇赞美爱情忠贞的小说，遭到粗暴批判。对此，当时的菩提并没有怀疑，更没有反抗，而是真诚地反复检查自己，真诚地强迫自己克服“多愁善感”，使心变得“硬化”起来，以为这样就能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一下子变成了革命的“敌人”！同时，她看到了沉渣的泛起，看到了革命口号掩盖下的种种卑鄙勾当。正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反常的恐怖中，菩提觉醒起来。从对这场“革命”的怀疑和反感发展为对以前曾深信不疑的“左”的路线的强烈不满和愤恨。经过反复的思索，菩提痛苦地承认：“我的心早变得太世故，发不出光彩了。有肝硬化，也有心硬化，灵魂硬化，我便是患者。”这是一个觉醒者勇敢的自我剖析，然而，这实质上就是